

第八届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

专题演讲

【题 目】：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与金融

【演讲人】：王松奇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时 间】：2007-10-19 15: 30

【主持人】：张国祥 重庆瀚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总裁

（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主持人张国祥】：

王松奇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所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创业投资协会会长。1990 年起任第四届中国金融协会理事，全国中青年金融研究会会长，现任第六届中国金融协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松奇博士分别于 1982 年，1985 年、1988 年在吉林财贸学院，天津财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近年来，主要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银行不良资产、创业投资研究以及加入 WTO 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等问题，主持参与了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

今天王博士演讲的题目是：《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与金融》，有请王松奇博士作精彩演讲。大家欢迎！

【王松奇博士】:

刚才曹博士讲得非常微观，非常具体。我呢，现在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虚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给大家增加点信息，另外讲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去年 10 月 16 日，十七大之前，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期间，设计了为十七大作理论准备的 20 个课题，中国社科院分了 5 个。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一个纪律，说十七大之前对这个课题的内容都不准泄露。现在十七大已经开了，我们也没说内容。但是我想这次十七大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国人也在关注，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在哪里呢？有些同志可能说是民情，但据我看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党情，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党政共完体制国家，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到底往哪里走，能走到什么样，完全与党的代表大会选择的领导人，然后在这次会议确定的路线以及随后出台的一些政策有关。

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题，以十七大前后中国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后的大致走向可能有点关系。但是今天，我尽量用一个最通俗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聊天的方式，漫谈的方式跟大家进一步讲。

第一，我跟大家讲讲中国面临的形势

我个人从小就比较喜欢学历史，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正处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最好的时期、最繁荣的时期。这个判断是竖着看的。五千年以来，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好，国家的状况非常好，国力非常昌盛。人均寿命现在达到最高，现在平均 73、74 了，这个俄罗斯对中国非常的羡慕，他们现在平均年龄才 50 多岁，我们现在已经 73、74 了，已经快追上美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就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现在竖着看是最好的时期。但是横着看，我们还差得很远，就是 1000 年前的中国，在北宋时期，当时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 GDP 总和没有中国大，当时的首都开封都有 100 万以上的人口了，当时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方方面面，都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那么在哪里落后了呢？大家知道，是在清朝，就在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康乾盛世的时候，我们落后了。是怎么落后了呢？那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了，因为只有 1 小时时间，我就不讲了。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总之现在呢，我们这个形势基本判断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第二，在这个最好时期，我们中国的经济以及金融实际是站在十字路口上，我们面临两条道路，两个前途

在这方面有一个真争论假问题，还有一个没争论真问题，就是关于两种前途两条道路的问题。

第一个真争论是大家听不到的。在北京的好多人也听不到的，就是实际上最近两三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包括一些老干部、退休老干部中间，包括有影响的一些中国的重要经济学家中间，在中国改革道路的争论上，实际上非常激烈。我们有一些非常尊重的老师、老先生，今年 85、86 岁以上的有几位，我们非常尊重的，这个就不能说名字了。从 05 年以来就开始写文章，写文章主要意思就是对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提出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包括一些文件提法进行置疑。而且就在十七大之前，我们有一位老先生，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给一些省委书记写信，总的意思就是现在中央的路线在经济上是修正主义的，就这个争论实际非常多。另外除了经济政策以外，在全球化上，在对外开放上，现在的争论实际非常多。不光是老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年轻人，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个真争论，但是是假问题。为什么是假问题呢？因为中国改革近 30 年来，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把它往回拉了。为什么不能往回拉了呢？老百姓不答应了，各个地方、地方政府不答应了，企业不答应了。所以我说它是真争论假问题。你不管它怎么嚷。因为我们一些老经济家从 2005 年 8 月把自己写得洋洋洒洒，一、两万言的文章实际都寄给中央领导了，中央领导当然是非常聪明的了，完全按照小平同志说的，不争论，你寄过来我们也看看，但是不争论，但是大家回过来想一想，6

月 25 号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然后 8 月 28 中央政治局的学习，集体学习，9 月 28 中央政治局研究经济改革发展教训，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你回想一下，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与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争论有关，就是党中央实际表明了一个态度，所以我说它是真争论假问题，它拉不回去了。所以中国的两条道路、两种发展前途，不是指那些有左倾思想观念的人说的那条道路和前途。那条路谁走，想走也走不了。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哪两条道路呢？是这样两条道路，是现代的这种相对缓慢改革模式下，政策组合相对无力、经济结构矛盾严重的情况下往前走，往前推；还是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想出一种新的思路，制定一个新的政策组合，使中国在经济改革，经济开放上，大步往前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重大胜利，使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变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现在面临的两条道路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发展前途。那么提出这两条道路，两种发展前途，大家就说了，那我们肯定是要走第二条道路了。第二条道路实际就是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道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走这条道路呢？

原因就在于经过这几届领导集体，从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实际上我们一直有三个障碍，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制约、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没法解决。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持续 15 到 20 年，年增长率 8%左右已经不可持续了。早在 1997 年亚洲危机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了很多高层次的理论讨论会。我在会上也说了，现在我自己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当时说我说中国除了淡水以外，中国什么东西都不缺，什么东西都过剩。现在我们一看，几乎什么都缺，什么得不够。原来说，刘易斯说劳动力无限供给，确实对于中国 13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那应该是符合刘易斯说的这个规律。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沿海地区光劳动力每年的缺口至少在四、五百万之间。我自己有体会，我自己在青岛办过企业，找不到人哪，不好找。特别是那些蓝领工人，熟练的技工，不好找，找不到。现

在我们看中央强调一定要落实劳动合同，工人签协议这个中央有些部门不调查，现在我们自己办企业我知道，你想跟工人签约，工人不给你签啊，哪天不满意他随时走人。因为签了对他有个约束，哪给工资高去哪儿，你们调查调查，保证是这样。现在除了劳动力以外，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能源，现在我们的能源进口、石油进口已经 33%以上，很快逼近 40%。我从小学地理的时候，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讲什么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那时候我们觉得中国富得不得了，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的样子。小学的时候学地理，我记得老师说，光大同煤矿产的煤就够中国用 500 年，现在想起来都是个笑话了。那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够了，我们几乎是这样。所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这是第一个矛盾。

第二就是高速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这个中国的环境问题全世界都瞩目了，前不久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公布全世界污染排前 30 位的城市，中国大概占了将近有 10 个，然后前 10 名中国占俩。中国占俩，第一个大家知道，临汾，山西的临汾。临汾我去过两次，后来再让我去我再不去了。为什么呢？你晚上在宾馆，不管多高级的宾馆，睡觉只要开窗户，有可能煤气中毒。临汾的姑娘不管十六、七岁长得皮肤多白，你看她毛孔里边都是黑的。为什么呢？煤烟熏的。第二是天津，因为是化工基地，它的污染，包括城市的规模建设造成的粉尘污染，灰尘污染这些东西，扬尘什么的，都是全世界前 10 名的，和环境的矛盾我们已经没法解决了。所以这个第二个矛盾就决定你中国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结构。

第三就是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就是这些年里，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实际上全社会的各个群体它不是大致均等的获得这个财富，获得好处的。我看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说，现在贫困人口已经降到 2000 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还是比较权威了。但是我每年都到农村去做调查，前不久我刚到吉林，我 40 年前下过乡到农村。我呆了几天，我带了 7 个学生，我指导的博士、博士后，搞了 200 户住户调查。选择了一个穷村的富村子，还有城郊的实地农民，那个城郊的村子我做了几天调查，有些农民的困难情况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下乡的农村有一个农民家

我去了，墙上戴着窟窿。一个同学跟我去了，是一个建行的一个处长，背了一个高级照相机，在屋里屋外想找有没有一袋米、一袋面或者一瓶油，都没有找到。锅台上都放着半颗白菜，锅都锈了，就这种情况还有。实际上我们到西北地区，到其他困难地区，可能比我看到的情况还严重。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两年来，中国境内的群体事件在不断增多，就聚众闹事，特别在农村。包括一些我们在北京常常也看到一些景象，你看工行，这世界股本量世界第一了，已经超过汇丰了，多光荣啊，但是工总行经常有人静坐在那儿，几十个人静坐。有的人冬天把棉被都带着，白天这个被子就拿绳挂着当旗帜，晚上盖到身上示威，为什么呢？他早年退休了，现在银行的工资都大涨了，他没得到这个，没得到补偿，所以去闹事。这个群体事件还是比较好的，银行退休职工还比较好的，还有好多地区农民可能更糟糕，所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是第三个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社会矛盾。

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上述这些问题，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原因我认为就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我们现在急需理清思路

我经常看一些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金融，包括对中国整体体制的一些评论。美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桎梏的一些学者，他对咱们有一个讽刺性的评论，说中国和美国比，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在国家战略上。美国是有明晰的国家战略的，中国呢？在国家战略上，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是吧，但是我们没有美国那么清晰，明确，而且有长期的战略。大家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它有经济周期，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有政治周期。每五年一次，差不多，是吧。而且这个政治周期与某届领导人有关。然后它到选举周期之前，它可能就相对的比较谨慎，注重社会稳定安定，这都是不错的。但是美国呢，它是两党制，它没有明显的政治周期，它有明显的经济周期，

我们中国大家知道，我在十七大之前，中宣部有通知，就是不准评论十七大。但是我写了个正面的文章，就是展望中共十七大，我们前不久有一些同学提出过了，我们一些老同学给它庆祝一下，在会上我们都是金融经济学家，都成名的了，

大家一致的感觉就是强烈要求给我们当年党史系的同学，胡华的学生，要给他再读一个党史的博士学位。为什么呢？我们都认为，如果对中共党史研究不清楚，对中国国情你就永远不清楚了。那么你研究中共党史，我们的 1921 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6 年了，这 86 年中，我们一共开过多少次代表大会。1945 年之前，你看我们开了多少次，24 年我们开了 6 次。然后毛泽东时期到八大我们当时是多少年，到九大、到十大、十一大开了多少次。所以我觉得这次代表大会，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期待，期待十七大能够出台一些新的，能有一些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写进党章，然后重视民生，当然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国家战略上，从党的这个路线的角度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描述清晰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我们有没有过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呢？有啊，大家知道，我刚才讲过，北宋的时候远远领先于世界，到元朝的时候，那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看到几百人在一个大浴池里洗澡，非常吃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纸币在流通。那时候欧洲人在干什么呢？到 17、18 世纪的时候，那伦敦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镇子呢。但是现在人家是什么呢？我们落后在哪儿呢？就是落后在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呢？我们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中国社科院有一个最著名的学者，叫顾准，他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他总结过，他说中国在国家战略上，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制约了当时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不管是谁打了胜仗，当了大官，就赏给你土地，所以社会标志，最重要的标志看谁是大地主，谁的地多，所以中国经济的本质是农村统治城市。在那种情况下，自古以来追究抑商抑工的传统，不让你工商业发展，那你资本主义萌芽能发展起来吗？你发展不起来了，是从封建宗法观念上。

还有一些学者，像德国学者，现在是一个德国裔的美国学者，泰德普兰克（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要是欧洲人口少，劳动力贵，然后促使欧洲人去搞

技术发明。

还有一位日裔的美国学者，叫福山，是社会学家，他作过一个解释，主要是中国这个伦理观念在起作用，中国没有发展。为什么伦理观念在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尊老的传统。不管是城市乡村，老人死了以后，把儿子叫到跟前，然后平分财产，甚至姑娘也有一份，也有一份不菲的嫁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欧洲不是这样，欧洲怎么样呢？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的直接社会后果是，老二以下，不管你多聪明，多能干，你或者把老大刺杀掉，干掉，谋杀掉，或者你自己出去创业去。所以欧洲从老二以下，自古就有一个创业传统。在小国城邦定义下，那么创业是搞什么，主要是经商，搞发明，或者是成为学者，好好学习成为学者，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所以欧洲与这个伦理、传统有关。

但是，我也作过解释，我认为主要就是，国家战略和文化价值观。国家战略就是我们中国从明朝开始我们就有机会，但是那时候的皇帝鼠目寸光，他搞禁海运动，就是禁止海边村民进行边境贸易。那时候边境贸易主要是和日本、菲律宾等这些国家，附近的岛国，中国第一岛链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那时候禁止，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禁止。我看过一些关于平倭的一些史料，杀倭寇，只要杀倭寇就是民主英雄，但是我从一些内部的史料看到，当年有好多倭寇，是边民当时跑出去，然后再回来进行贸易，然后这些当时清朝的一些边防官员也是素质出干部，培养政绩呀，就得杀多少人，交多少人头，证明剿倭有功。也有些是搞贸易的边民，中国出去的，这都有。所以禁海运动，从禁海运动开始，中国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位一个内陆国家，没有走向海洋，然后到了乾隆，大家知道乾隆本来非常英明的，但是 1792 年，马戈尔尼带着英王的信来的时候，要求和中国进行平等通商，咱们不干，给人拒绝了。乾隆回了封信，大意就是说我中华地大物博，我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应有尽有，不和你通商我也能过得很好。你看乾隆很英明的，但是他使中国失去了最重大的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然后导致什么呢？你们不开放吗？就导致 40 多年以后，然后人家就给你敲开大门，你

不开放，48 年以后，1840 年我打你，我把门给你敲开，敲开就是为了贸易呀。至于鸦片，鸦片是贸易的内容之一，我们现在的史书有些片面的地方，实际上当时贸易内容也很多的。但是打了以后，从 1840 年以后，一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基本平均在 3000 万两左右，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最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那几年挣的钱白银后来都流出去了，作战争赔款，都流出去了。我们为什么穷，后来为什么穷啊，它是因为当时国家战略选得不当有关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国家战略，当然我还讲了一个文化价值观，你看欧洲 14 世纪就文艺复兴萌芽了。那但丁几百年前就写出神曲来了，长诗啊，那是文艺复兴的萌芽。然后人家出现了一大批的学者，什么哥白尼、布鲁诺、牛顿、马克思，你看那 19 世纪 40 年代就写出资本论，那么光辉的著作了。我们到 1905 年才废除科举制度，也就是说到上个世纪初叶，前五年，全中国最出名的青年人，还在背那一万五千字的《论语》呢。已经背了两千来年了，背一本书，你能进步吗？这文化价值观没进步，科学技术你没放开，你没有开放的眼光，不讲科学你怎么能进步呢？所以国家战略最重要。

第二点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政府定位和政府职能

大家知道中国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中，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首长，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样，整天忙着招商引资，研究怎么发展地方经济。我去过一些国家，我看都没有，就中国，这个现象特别奇特。今年春节，我是在塞班岛过的，恰巧听到塞班岛总督讲话，他说今年执政的方针依然是不搞什么城市建设，主要是给大家提供安定的祥和的生活，给大家一个安全祥和的环境，他就搞这些，搞公共服务，搞点这个事。好多塞班岛房子很旧很破，它也不建，它本来是很有钱的，每年旅游收入那就够了。好多国家都这样，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不是这样，但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经济参与得过多，管得过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可以看出，就是地方政府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易热难冷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大家知道，今年从去年8月的时候，锦涛总书记作过判断，说要防止经济过热，然后今年政治局会议上也明确提出防止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那么过热的最终推动力量在哪儿呢？这几年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在分析，你按货币供给增长率，我们M₂，18左右，然后投资20多，然后再分析下这种投资过程，主要是地方政府收入和企业储蓄在起关键作用。所以地方政府的行为现在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失衡问题他有绝大关系，凡是议论经济过热，凡是出现重复建设，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影子。包括现在房地产，房地产大家知道，我们中央不管你出台多少政策，那招法都被一一化解，但是背后谁在起作用呢？实际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同盟军，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从80年代中期，实行财政地方分权以来，1993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与中央政府坐在板凳对面的博弈力量。因为93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从税源上，拿走了有利的税源太多，我们大家看了，我们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30%以上，GDP增长11%，财政收入增长30%多，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不可理解的，你拿这么多干什么呀，然后造成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称，他想干的事很多，但是没钱，没有一个稳定的财源。过去呢他靠乱收费，现在我们中央政府在制止他乱收费，那么他怎么办，很多地方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变成土地财政，他手里唯一可支配资源就是地呀，大家知道大连这两年的口号在建设大大连。那夏德仁是我的老朋友，他念博士、当青年教师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现在他当市长了。建设大大连，我们有些朋友和夏德仁市长也比较熟的，说大大连是什么呀，说知道的人知道你是搞土地财政，不知道还以为你们领导都是结巴呢。

我这次到吉林松原市去做调查，到一个乡，和这个乡党委书记、乡长谈，这个乡镇除了工资走预算以外，我说每年你工资以外的费用一年多少钱。他说王教授你猜一下吧。我说20万？他说你再猜一下。我说那30？他说你别猜了，你越猜越离谱了，我一年才3万多块钱。一个乡啊，一个乡政府，那么多人，他说每年招待、冬季取暖，这样事那样事，一年只有3万多块钱。他说，每年我光就中

央、然后省里、还有市里县里下的红头文件，让我们定的报纸、杂志，在我们这个乡，从乡政府出去就 15 万多，但是每年全部费用只有 3 万多。事权财权严重不对称，这个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畸形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再看温州，温州的书记原来是萧山的书记，然后到温州当书记，他宣布温州要二次创业。二次创业你看什么内容呢？要搞中华工业，为什么搞中华工业呢？就是在中华工业方面搞这个，它地方收入流动多，解决就业解决得多，GDP 增加得快，他所有的这些行为，背后都有我们一个制度设计的毛病，所以地方政府行为是造成我们整个经济失调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因为你搞别的都是假的，地方如果就业解决不了，地税没有，城市建设、城市面貌都改观不了。我们国家钱也多，而地方没钱啦，一个地方可支配的市政收入没有，你没有充足的地税收入支持的话，马路残破，市容邋邋遢遢，这都与钱有关，最后都是这个钱的问题，所以地方政府行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有绝大关系，必须对政府进行职能重新定位，中央政府，中央的各部委，地方的各层政府，必须在职能上进行重新定位。

我看锦涛总书记这次在报告里说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是钱从哪儿来，税收和中央怎么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解决不了，而且在政府改革上，还有很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央层面的各部委的问题。比方说刚才我讲的例子，定报刊杂志。定报刊杂志啊，那个红头文件堂而皇之下去到全国去了，不管发行量多大，发行费收入增加多少。最后，你研究到最后，它就解决了一小帮人发奖金的问题，非常可笑啊，就是部门利益，现在全国它和地方政府这个不恰当行为相交织，你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在讲现代银行，归地方政府管的银行，任何银行只要发展好，地方政府保证派干部。有些小银行不大，给你派四个书记，为什么呢？这个银行一开始建的时候它比较傻，本来是企业，但是他一定要行政级别，因为在好多人眼中中国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行政级别。其他有钱都不行，没级别不行，你必须弄一个什么级。所以银行出来以后，你要是弄一个正局级，好，像省一级的、直辖市的正局级银行，你看着

吧，成立两年效益一好，工资一上来，上面的市委组织部一定给你派干部，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是吧？而且一派书记以后，书记就排在行长之前了。就像我到一些地方看，有些地方我去了下面请客，常务副市长请客，坐到主位上是组织部长。我说常务副市长跑那儿坐着呢？人家说那是常委，组织部长是常委，党的一些东西重要，所以造成一种扭曲了。所以，我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结构容易出现失衡的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三，我个人认为是政策失误

就这些年我们本来想出一些好主意，有过一些好的政策组合。但是到这些年以来，就落实不下去。比方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也有风险投资的，在 1985 年的时候，它就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科技管理改革体制的决定了，这已经有 22 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创业投资还是幼稚产业，全国现在总量三四百亿，但是这是号称了，因为我是北京创投协会会长。实际上好多公司拿这个钱炒股票去了。深圳的创投原来号称全国第一大，后来山东成立 20 亿的，政府给 20 亿，他变成第二。然后阚治东到南方证券当总裁，拿走 7 个亿炒股票，全赔进去了。现在深圳公司在全国排名上已经不行了。全国像这种创投公司很多，然后这个创投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

那么你们是搞担保的，可能会问创投有什么重要性呢？实际上你只要对最近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你就会看到，真正推动一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是创投业，是成长导向型、科技导向型的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大银行。大企业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所有的大企业，它的创新实际上都是着重于自己的产品链条，为自己某个新产品改进，增加一个部门，它所有的投入都是为着原有的产品链条服务的。而且你看，世界最近二三十年，那些带有横空出世的想法的中小企业都哪来的呢？都凭空产生的。为什么现在欧洲、英国好多国家强调发展创业产业？我们也有一个决定，在北京郊区也在搞园区，在通州给了 1500 亩地，也在搞这个园区，那个园区。但是这些年我们始终在政策上存在失误，没有一个有利的举措把这些东西系统的搞起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在政府，为什么呢？你改革是主导型的，政策是由政府出的，制度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是提供制度的，所以政府的角色最重要。政府角色最重要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回首改革开放 30 年的伟大成就是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去看几大问题，那政府也有政府，责任在你，你没有找到好招法，或者你找到好招法，你没有一个好的执行力，没有一个有执行力的政府。

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在文化价值观上

这些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大家都避免谈，都不谈。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在文化价值观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新的视觉，那我们今后再发展还会面临相当大的制约。一个国家靠什么呢？大家知道靠人，是吧？那么人有社会上的人，有个人、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但是最后影响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是什么？经济学有一个词叫公众（public），public 是所有这些经济主体，它各种诉求、想法、影响力综合的东西。公众影响力，公众发展力它的发展潜力最终由什么决定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

首先是经济，经济技术。再一个政治军事，这主要对内对外。还有一个是文化教育和价值观。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在价值观上有较大幅度提升的阶段，应该是这样。那么这个工作谁来做呢？可能靠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当然经济学家也要参与，这个工作比较难。我从小比较喜欢文、史、哲，但是我想了怎么能够概括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既没有那些所谓复旧、复古、复左嫌疑，也没有犯错误的可能性，找出一种东西，能够融入全球化，然后在全球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显得我们中国和你整个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匹配。就是中国人不保守，不落后，在哪方面都和国外比得过去。当然，这需要我们全国的学者，那些最聪明的人来做工作了。刚才我讲党非常重要，可能得二十大以后，然后得再有 20-50 年时间看看我们的学者能否搞出一套东西来。在文化价值观上，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老是说一些大家都感到很旧的提法了，因为这些提法提来

提去，变成了我们所有的当官的，有行政级别的都带着面具活着，开会变成说假话比赛，那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届领导集体最让全国人民称道的就是反对形式主义，讲实事求是。今年几次讲话锦涛同志都说要思想解放，要创新。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思想上的信号。我们有好多问题解决实际上都有文化价值观有关。

那么讲讲处方吧，用什么招法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呢？

我重点从金融上讲讲

我觉得中国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资源分配不合适造成的。从全社会看，我们学马克思理论的时候，生产、交换、流通、分配这几个环节，其实分配最重要，分配好象是最不重要，实际分配最重要，它决定整个社会所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马克思当年在写《资本论》就说了，你可以说这个制度怎么样，但是你不能动他腰包里的一钱，你动了他腰包一分钱，他就和你没完了。

那么谁管分配呢？现在中国全社会的钱 99%以上都在金融系统里。财政也重要，财政的钱你不是也得存到银行里吗？全社会的绝大多数钱都在金融系统。通过金融改革，从资源配置入手，我们可以解决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大多数问题，绝大多数问题，可以这样讲。所以金融政策最重要，这个观点我在去年 11 月 2 号的时候，华建敏同志请几个人到中南海，说你们几个，我们要开金融会议了，你们几个对中国金融随便讲，每人 30 分钟，童叟无欺。后来我发言说，要开金融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对金融的重视问题，因为我们看所有的中央文件金融都是排在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的第几小点，然后有几句话就完了。那不行，你没有排到前面，必须说要它到重要，说它重要，提到重要日程？然后出台一套组合拳，你才能够对中国经济结构矛盾，增长方式转变啦，社会面临的问题上才能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所以，第一条我觉得首先在战略上，回到我刚才说的战略了，中国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GDP 总量第四，贸易量第三。然后要不了几年，估计几年内，我们变成贸易量第二，GDP 第三。然后 30 年左右差不多 GDP 总量第一，有可能。正常情况下，要打仗，不出特殊情况有可能

是这样的情况，按照 10% 的速度这么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无论怎么干，你是一个经济大国，你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人均现在我们 2000 美金，人家富的国家都五、六万美金了，你才 2000 美金，差得远呢。第二，你有各种资源约束、环境约束，甚至有体制、观念上的约束，你可能追不上人家。第三，你无论发展怎么快，我们干的都是粗活，什么服装、玩具、集装箱，都是一些低挡的东西，低技术附加值的東西。我们看国家统计的数字，说今年外贸出口额是 4 万亿了，外贸顺差 3800 亿。不管外贸顺差多大，实际上我们出口的主要东西有技术的是贴牌的，主要是人家的东西。包括海尔企业出口再多，但是他的核心元器件都是进口的，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都不多。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必须解决你要成为贸易大国、经济大国，还是成为贸易强国、经济强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金融上怎么做呢？从全世界情况看就是发展创业投资。你指着银行去支持创业型中小企业，那没门儿。因为我是民生银行独立董事，民生银行很多年前在中关村设立支行，说重点支持科技企业，后来整来整去，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是科技企业风险太大，银行业没有这种专门对企业的技术风险能够进行恰当甄别的人才，做不了。中关村担保公司的老总我们开会他也经常参加，也是苦辣酸甜什么都有，不好弄，而且中国技术骗子也多。从全世界来看，靠银行支持是不行的，就得靠创业投资，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这是第一招，你要改变目标，从大国变成强国，然后服务于这个。

第二，就是解决结构问题

现在我们结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严重过剩。那么从哪而过来的呢？大家看货币供给增长率，那每年控制和过去以往的高，也不显得不高呀。那么显然主要是外贸顺差造成的。每年我们在这种强制结算汇制度下，外贸进口的大量外汇收入中央银行被迫把它用基础货币去买它，然后人民币投入流通，投入流通以后央行再通过央票，什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往回收，再收人民币，造成这种大家都紧张兮兮的一种恶性循环似的宏观调节。

现在我们房地产热下来了吗？股市热下来了吗？没有，还没有解决。那么根

子在哪儿呢？我个人从 03 年开始我就一直说根子就在汇率上。现在什么也别想，眼睛一闭，痛下定决心，汇率涨 20%、30%的，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什么通货膨胀，什么房地产热，什么股票热，宏观经济失衡，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全都解决了。但是，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下了不这个决心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沿海工业受损，担心大量企业关闭，造成社会不安定，担心我们实际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引擎失去动力等等，担心非常多。没人敢冒这个风险，而且有人错误的总结了 1985 年日本广场协议后所谓十年的经济教训，说主要是日元大幅升值造成的。实际这种总结都是错误，我看了大量的资料，这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我们想不开，现在我们比方说按照我说的招法去做，我个人认为，比方说猪肉涨价，粮食涨价，大家知道我们每年进口那么多东西，进口总额中有 1/3 差不多是原材料，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原材料，为什么呢？中国缺，不够，没有。另外，我们还需要进口高技术设备，特别是石油等产品，我们每年因为汇率问题你吃了多少亏呀，汇率不断下降。好多同志会问了，这有银行来的同志，我们从 2005 年 7 月 22 号汇率已经改革了，改变汇率形成机制了，我们兑美元现在升值幅度已将近 10%了，不是这样吗？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多来，由于美元兑欧元、日元大幅贬值，我们实际有效汇率还下降了，为什么我们对欧盟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大家看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美国了，因为对欧元，我们人民币变得更便宜了，因为全世界的贸易 60%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我们出口的东西更便宜，所以对欧盟出口，增长速度变成第一了。实际有效汇率你没升反降，所以汇率问题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这是第二点，改汇率。

第三点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多层次资本市场，我 2001 年 11 月我到韩国国会去做演讲，韩国人比较性急，大家知道美国叫 NASDAQ，韩国叫 KOSDAQ，中国英文叫 CHINA。他给我拉一个横幅，叫做 CHISDAQ 演讲会，我说我们中国不叫 CHISDAQ，你们怎么给改名了呢？他说就是那个意思，你们不叫创业板吗？我也知道。他汉语说得很好，他说我知道你们叫创业板，你就叫 CHISDAQ 演讲会，后来演讲完了，KOSDAQ 总裁给我聊。

他说王教授，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交易所吗？我说我还没有统计过，很惭愧。他说有 600 多家，中国占世界人口大致 1/4，你中国股票市场的最佳规模是 150 家。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想法给中央领导写一个建议得了，做为国际友人写个建议，不要说 150 家，建 15 家，中国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中国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领域出现最大的现象就是中央收权，收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因为原来我们有 22 个场外交易市场，都关掉了，一直在关。现在看，我们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钱过多集中于银行系统，造成风险非常集中。银行放不出去，然后中央银行在那儿猛提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又拿去了，它拿去更闲着。钱闲在那儿仅仅是钱的问题吗？那不是呀，所有的钱都不是白出来的，每一元钱背后都是代表着一元钱的物资。所以，你整个货币周转速度放慢的背后是整个实体经济、实物资源运转速度的放慢。大家知道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在 10% 以上，今年可能到 11.4%，这个速度快不快？快。但是去年，11 月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杂志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何如此之慢？》。我看了以后非常吃惊，他是怎么分析的呢？他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主要在体制，在无效的金融系统，然后他算出来了。说银行系统如果提高效率，不要说像美国了，像欧洲了，像日本了，就像印度那样的效率，那么可以凭空使 GDP 增长 6 个百分点，然后资本市场增加 5、6 个百分点。他说总之金融系统提高效率，和世界一般水平差不多的话，你 GDP 可以凭空增加 17 个百分点。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从 1978 年到 1988 年念了 10 年的金融系，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在银行。好多都当了行长了，按照我们的年龄，再不当行长太笨了，好多行长。你跟他们谈谈，在国有银行任何一笔贷款，如果半年能拿到那是快的，一般都给你拖上九个月或者一年。你想想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下大家比什么呢？比效率、比速度。你的贷款一年下来以后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我们整个金融系统是低效的。我个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我看了十七大期间国家发改委的领导答记者问了，他认为现在没有全面过热，我非常赞成他的结论。没有全面过热，为什么？和你的潜力比，和你的供求状况比，和现在这种短线制约的原来的经济

衡量条件比，现在没事，没有出现全面过热问题，还有潜力可望。现在怎么做呢？就是让银行的钱出来，建很多的资本市场，就场外交易市场，全国至少建 10 个以上，挑好的。因为大家知道有“9+2”制度，大区行嘛。按照大区行的规划，大区行现在没事干，想改也改不了，干脆让它监管和将来当地的金融部门合作一起开办类似于赌场的场外交易市场进行监管得了。你只要赌场一开，赌徒来了，没啥风险。我到台湾去了，我看过，台湾那么小岛，三个市场，主板市场，然后是新贵市场，它一共有三个市场。大家买股票，就像打酱油买醋一样，没啥，很普通。

我到吉林省东化看过，那没上市的股票，像卖茄子、辣椒似的，在地上摆摊，有的一传说可能上市，那由一块钱涨到六、七块钱。我都亲眼见过。你说有风险，没有呀，所以发展直接融资，多建一点资本市场，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大家知道，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都是多层次市场，为什么我提出多元化呢？就是给地方一定的金融控制权。因为现在我们地方城市银行归地方政府管，农信社都交给省级地方政府了，大家看，出事了吗？没有，发展的速度远远超乎想象，地方政府的作用有相当积极的一面。那么这种市场也交给它一块，我看也没有问题。

第四招，立即实行混业经营

现在我们钱憋着，憋着什么原因呢？是钱用不出去吗？不是，就是你管得太死，你不让用。那保险公司的钱多到哪儿去了。我几年前就给中国人寿的资产管理公司做课题，当年它手里钱不到 5 千亿，现在可能 7、8 千亿了，它每天进 5 个亿。你想想它有几年了？保险公司钱用不出去，然后保险公司的大小公司待遇不一样，大公司投资领域多一些，小公司你用了钱就查你，处分你，就是金融管制过严。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堂而皇之的、大张旗鼓的，非常正义而又光荣的转变。大家都搞混业经营，机构混业，业务混业，交叉销售，把钱都用活，金融资源用活。现在中央银行和监管委员会，不让人用钱，整天抽紧流动性。都说流动性，今天我坐飞机来挨着谁呢？挨着华夏银行的副行长，我

们俩早就认识。他讲，刘明康主席开会，刘主席让我发言，我说了，我先申明，说刘主席，我说话肯定不中听。他说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整天看着我们，讲流动性过剩，我们的流动性在哪儿呢？全国股份制银行都缺钱呀，谁都知道，没多少钱呀。为什么它网点少，存款来源少呀，那工农中建钱多，邮储系统钱多，我们的钱在哪儿呢？哪有那么多的过剩流动性。我们在同业市场拆一些，我们的成本多高呀，没多少流动性。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观念转变，立即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把钱用活。这是第四招。

第五招，我个人认为，在融入全球化方面应有整体的制度安排

比方，现在人民币走向自由货币，自由兑换，这是方向，但是怎么走？现在比方说要开什么港口直通车，要 QDII 是吧？要把钱引到国际上去，然后也成立了中国投资公司。这些都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最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解决内外平衡问题。就是这些钱你假如投到国际上，买国际的商品实际上没有拉动内需。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是货币过剩和短缺同时并存。我们一方面是流动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三农领域、县域经济、民营企业、科技成长型的中小企业严重缺钱，我们为什么要开这种担保会，为什么担保公司大家都急着要发展壮大，就是有中小企业求贷无门，它有资金短缺问题，全国的情况都是一样。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这种情况，钱还要拼命向国际上跑，我个人认为我们就有一个在制度上、政策设计上不太合理的问题，应该先内后外。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要做世界第三领袖的，我们说勒紧裤腰带支持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改革开放之后，我记得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当时说一定要先内后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再解决无产阶级国际义务问题。我们现在在尽国际义务啊，我们在全国外贸企业 2/3 增汇不增收的情况下，在这种货币币值严重低估的情况下，拿了那个宝贵的外汇以低息贷款，变相低息贷款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去了，那个长期利率只有三点儿，四点儿。但是美国的直接投资商，在上海地区的投资商。有时候美国的商务什么学会给我寄一些东西，一些出版物。它有一个统计，美国

商人在上海投资平均收益率都在 20%-25%之间。人家 3%、4%拿你的钱投到你这儿来，你想想，我们贴了多少？倒贴了 16%以上，傻不傻呀。老百姓缺钱，农民都缺钱，民营科技企业都缺钱，你投到美国去了，你中央银行的权利可大了，是吧？管的钱多了，但是你国内的事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有些人为什么不愿意做这方面大的改革呢？一个是监管懒惰。在全世界金融学中有这种术语了，监管懒惰，他想省事。另外就是它有风险，麻烦。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出台一系列的系统的招法，就是按照我说的一、二、三、四、五，把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尽快从经济大国拉到走向经济强国的轨道上去。在这方面金融可做的事非常多，那就靠我们大家努力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国祥】：

谢谢王博士！王博士从金融和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现在发展当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也提出了解决之道，视野开阔，信息量大。相信王博士的观点会引起与会代表的深度思考和实践探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王博士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